

Survival and Renewal——Review on the Researches of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Reform in Modern China

Lin Q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academy in the Qing Dynasty mad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academy replaced by new-style schools. This process not only replaced the name of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but also includ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ith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the west relationship issues.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history,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new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is paper is a speci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academies in modern China. It mainly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eform of academies since the 1980s, trying to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groups in this field. The reform of academies involved many aspects, such as political reform, cultural thought, social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had been correspo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se aspects, but the dire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academies was relatively few.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academies needed to integrate var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to avoid the preconcep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modern new education, we should know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 of academies practically.

Keywords

modern china;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reform

存故与趋新——近代中国书院改制研究综述

覃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北京 100871

摘要

清代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机构被新式学堂取代,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还包含着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化和中西文化的关系处理问题。对这一历史的再认识,尤其是中国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关系处理,关系着中国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发展方向。论文是关于近代中国书院改制研究的一篇专题性综述,主要对80年代以来与书院改制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研究加以评述,力图呈现该领域探讨的主要问题、研究方式、研究人群等。书院改制涉及晚清政治改革、文化思想、社会结构、教育变革等多方面内容,这些方面业已有相应的学术成果,但是直接关于书院改制的深入研究却比较少,书院改制的进一步研究需要综合多方面研究成果,尤其是避免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新式教育之间存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书院改制的历史。

关键词

近代中国; 书院; 改制

1 缘起

中国当下的教育社会学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当下社会中的教育现象,如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公平、教育改革等研究,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以及在近代发生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教育问题,如中国传统书院的研究就比较少,搜索近十年来教育社会学研究论文目录所得到的结果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就论文的主题中国近代的书院改制研究而言,作者搜索到的研究文献主要来自历史学、教育史、

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学人,相比而言,社会学的学者就要少得多。教育研究者讨论什么样的问题,不仅仅反映了个人的研究兴趣,而且还反映了学者对中国教育的理解和其内在的价值认知。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谋求独立富强、民族昌盛,教育在这个过程中被人们赋予了太多期望,历经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实践,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事业是中国人的追求,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好的现代教育,这其中还存在很多争论。

反观今天的教育,如果说教育社会学把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教育现象当做自己的学术使命,而要想获得对教育问题的深入理解,除了继续对当下的教育现象做扎实地调查研究之外,很有必要回顾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考察近代激烈变化中的教育变革——教育的变革本身又是和其他思想文化、政治革新等多方面交织在一起的——正是近代的教育变革和实践深深地塑造了今天教育的基本面貌,如现代学校系统和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等。

“现代性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和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1],钱民辉教授对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的这一理解是很有洞见的,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引下,论文认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来考察中国的教育。而清朝末期到民国这一历史阶段,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亦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当时在文化、政治、教育等各领域里的革新无不深刻地影响了后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制度建设和生活方式。中国作为拥有悠久文明的古国,其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教育传统,如传统书院教育、科举制度,有着哪些重要的社会价值,在近代社会为什么消亡,它们对新式教育的发展又有哪些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当下教育问题上仍不失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就有各种恢复或重建书院办学的活动,发展至今,民间书院和小私塾的数量已经不少^[2]。这些民间书院和私塾主要开展蒙学教育和基础教育。另外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也先后成立以书院命名的教学研究机构,这些以书院命名的机构在理念和制度上与古代书院有很大差异,但是使用书院这一名称似乎彰显出在精神上对古代书院的有意接续。如果将时间推到一百年前的中国,看到的则是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中国传统书院纷纷被新式学堂取代。民国时期,在新式教育体系已基本确立的情形下,一些新办书院更是难以维系。对比中国教育在一百年前后出现的戏剧性变化,不得不追问中国新式教育中传统教育的位置以及二者关系问题,中国教育领域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未来教育的发展似乎又和中国古代教育传统有着深沉的勾连,也促使人们回到近代思考包括书院在内的传统教育组织曾经的历史处境和命运。另外,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教育领域

倡导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和古典教育,引发的讨论,也促使人们思考中国自近代以来面临的中西文化问题,具体落到教育研究上,就是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设中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民国以前,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包括中央和府州县各级官学,书院、义学、社学、各类学塾等。论文选取其中的书院,围绕晚清书院改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2 “书院改制”概况

书院的概念认知在学界尚有争论,也就是对书院基本性质的问题尚存在多种理解。论文暂不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兹援引邓洪波的书院定义,暂且使用之。“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下,围绕著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3]书院经过1300余年的发展,遍布在除今西藏之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是古代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培养人才、促进学术思想的传播与创造,在地方教化、移风易俗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书院之所以能发挥巨大作用,除了来自中央和地方上社会力量的支持之外,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院制度本身的完善性。书院取法佛教的禅林制度,又与中国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组织系统、教学制度、经费管理等方面积累有宝贵的经验,使其得以在数千年的历史潮流中存续发展,生生不息。

书院从诞生之初发展到清朝的1300多年间,也经历过各种历史洪流的冲击,比如早期作为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一种私学组织,书院在缺少足够财力和人力支持的情形下,也长期沉寂。另外因为书院后来的自由讲学传统,有时还会受到统治者的抑制,比如明代中后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就发动过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然而书院的规模却不断壮大^[4]。清末,中国遭受西方入侵,饱受欺辱的中国人寻找到的出路之一就是教育革新、教育救国,即通过培养新式人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思想来救亡图存。尤其是针对清末教育中的腐败现象和书院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变革书院、建立新式学堂等主张。然而也正是清帝的一纸政令下存在千年之久的书院被废止了。

书院改制是在清末中国社会遭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和压迫、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社会形势下进行的，有着特别的社会背景。当时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主张社会变革以救亡图存，体现在教育上，认为以科举之学作为书院考课、教学内容的教育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富国强兵和对新式人才的需求，迫切需要进行变革。晚清书院的变革始于19世纪80年代，一般认为书院改革主要有三种主张：书院改学堂、变革传统书院和创办新书院。在清末新政以前，书院改革主要通过调整书院教学内容、增加西学来变革传统书院或者创设讲求西学的新书院这两种方式进行。直到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正式提出改书院为学堂，改革书院的方案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论文认为广义上的书院改制包括这三种书院改革方案，而狭义的书院改制主要指在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中在清朝政府颁发的政令中明确提出的改书院为学堂这一措施。

书院改制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接受康有为在《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的激进办法，发布上谕，限令各省两个月内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该书院改制上谕后虽因戊戌政变而停止实施，但在清末新政过程中，书院改制依然推行，并采取了将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的激进办法。第二就是，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4]。

广义的书院改制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理解，除了以上两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书院改学堂的教育改革之外，还包括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变革书院的行为，以及清末新政清廷发布上谕之后，各省在推进书院改制时的实际运作情况及其结果。论文作为一篇关于书院改制的研究综述，重点关注书院改学堂这一内容，同时考虑到书院改制前后相续的历史过程，对戊戌变法前书院改革实践，新政政令颁布以后各省及地方的具体执行情况，以及其他从学制变迁、中西学的转化等方向开展的研究也加以关注。

3 书院改制的争鸣与商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年从事中国书院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学者邓洪波在其《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一文中，通过对戊戌书院改制和清末新政中书院改制中朝廷颁布

的政令以及重要大臣的争论进行分析，辅以相关统计数据，主要是就新政期间书院改制政令颁布以后，全国书院改制时统计表和书院所改学堂类型统计表，再加上湖南一省在这两方面的数据的分析，认为书院改制是晚清特殊社会背景下一种救亡图存的应时之举，属于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作者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制的，并非正常的衰亡；而且在书院改制之前，一些传统书院已经通过引进新学、西学以及改善组织管理等方式自我改造，适应时代需要，另外一些由社会有识之士创建的新式书院在教学宗旨、学科内容等方面与传统书院已不同，所以说改书院为学堂并不是书院改革的唯一选择，它是晚清书院改制的三大方案之一。但是历史的现实是三大方案未能齐头并进，改制取代了改造和新创，成为唯一方案。作者进一步认为，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经学学科被排斥出学校教学科目，改书院为学堂丧失了赓续传统的两大支柱，从而偏离了书院改制方案制定者张之洞设想的中体西用原则。改书院最终变成了废书院，甚至是毁书院^[5]，笔者认为这是书院改制的要害所在。

邓洪波的研究把书院改学堂作为晚清书院改革方案之一来看待，突出了以往不被重视的书院改革的其他方案，并且认为书院改学堂是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邓洪波的这篇研究比较简短，有些结论关联着书院改制的几个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作者提到的书院改学堂在何种程度上赓续着中国教育的传统。另外，作者所说的改革书院的三种方案，在实际运行中，何以书院改学堂这一方案成为唯一方案。书院改学堂，究竟是名实都改，还是名改而实不改。关于书院改学堂的“名实关系”问题，谢丰在《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作者通过考察湖南的书院改制情况以及书院与学堂名实关系的演变，指出伴随着政治斗争，两者关系经历了“名异实同”、“冲突破裂”、“名异实异”三个阶段，并且认为书院、学堂的名实变化及传统的正名思想与传统教育的弊病、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一起构成书院改制的主要原因^[6]。书院改学堂的“名实关系”问题与书院改制的原因有重大关联，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将在后面介绍。

邓洪波的研究结果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书院改制的方向、估量其价值意义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陈平原在《大学之道——

传统书院与中国高等教育》一文中表达了类似观点。陈平原认为，19世纪末，中国的科举取士被认为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和舆论准备。然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致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陈平原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在于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7]。陈平原的观点与邓洪波在前面的观点比较一致，但是在陈的文章中没有列举相关历史文献材料来证明作者的观点，其文主要提供了一种关于书院改制及其后果的看法。

张传燧和李卯合写的文章《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虽然没有直接分析书院改制的过程，但是运用一定的历史材料对戊戌改制前书院的自我更新与调试和有识之士办的新式书院的教育革新实践，也就是在前面邓洪波文中提到的书院改学堂之外的另外两张方案——传统书院的改造和创建新式书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文章从造真才济实用的办学宗旨、中西并重的现代实用性课程的设置、近代意义上的教学管理制度、大量介绍近代教育科学等知识的图书这几个方面讨论了书院改制之前的书院革新实践，认为这些实践为后来的书院改学堂、书院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内在条件和可能^[8]。论文认为晚清书院改制为中国近代学制建立提供了本土基础，但是这篇文章对晚清书院改制在何种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关键问题则缺少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书院改制的得失问题尤其是改制之后的学堂在何种程度上去除了原有教育的弊端、保存了传统书院教育的核心精神等重要问题上，历来争论不一。缺少材料证据支持的观点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要对书院改制的得失作出判断，还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支撑。

上面分析的研究文章都是较为简短的论文，刘少雪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一书，是笔者找到的唯一一本以书院改制为主题的研究专著。作者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较为全面地、详细地分析了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中国古代教育的主体机构——书院遭废和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作者对书院改制前的书院发展和改革状况进行了详细论述，从鸦片战争前、鸦片战

争之后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至书院改制诏令颁发三个阶段讨论书院调试情况，对前面谈到的书院改革三种方案的研究是很大的补充。在书院调试部分，作者运用数据证明参与调试即自动革新的书院数目很少，从时代大环境中去考察，其转变的速度又太慢^[9]。相比于后来清朝政府针对整个教育制度进行大规模和深层次的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改革，书院的这些调试只是一些零散的、无系统的补偏除弊的手段方法，本书作者对书院改制之外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这两种书院改革方案的评价与邓洪波的研究结论并不相同。

刘少雪的文章重点对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书院改制的前期准备和具体实施以及改制结果进行分析，探讨了书院改制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作用的问题，展现了书院改制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丰富的历史面貌。比如，分别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学者、张之洞等政府高级官员、普通地方官员和一般士绅不同人群分析他们在书院改制之前的思想观念和相关教育实践，以及这些人对书院改制的推动作用。作者还从不同省区间的差异、不同级别书院之间的差异、各书院内部的改革程度差异对书院改制政策的整体实施情况进行分析。还有对书院改制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的揭示，如无可循、思想舆论上的混乱、师资和教材的缺乏等。作者的研究为理解书院改制的整个过程绘制了一副简图^[9]。书院改制涉及多方面内容，诸如不同层级人物的思想观念、国家从上到下的制度改革过程、书院与科举的关系等问题，要深入而深刻地理解书院改制并不容易。

刘少雪的研究在书院改制研究中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只是作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运用，使其对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存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比如，作者在分析书院改制过程时，一些书院没有改为新式学堂，而是改为校士馆或者存古学堂，有些则拒绝任何形式或性质的改革，作者认为这是“书院改制的不彻底性及近代学制中的封建性尾巴”的表现。事实上，这些现象尚值得深入讨论，有其复杂性。所以在刘著的史论结合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作者的观点受时代影响，但是也引发进一步的对话和探讨。

4 书院改制的个案研究

书院改制是一场波及全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活动，对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的书院改制情况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从整

体上把握书院改革的推进情况及其成效,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理解各省各地在书院改制上的差异性。论文搜集到了自2000年以来对湖南、贵州、山西、陕西以及上海书院改制研究的论文共5篇,它们多是来自师范院校的硕士学位论文,现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进行介绍。

谢丰的《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是诸篇关于书院改制的硕士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者对湖南省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的书院改制情况做了介绍,既有对重要书院的改制情况的分析,也有对整个省份的改制书院在改制时间和改制内容上的统计分析,还有对湖南书院改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官绅的参与情况进行了讨论。这些以省份为单位进行的书院改制的研究勾勒了各省份书院改制的概貌,一些著名人物和省著名书院在改制中的情形有所呈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但是书院改制情况本身极其复杂,一个省份的书院改制情况涉及的人事也是多方面的,所以,这些研究探索性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地方书院改制的研究中,像湘西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改制也得到了关注。王星关于清末湘西书院改制的研究,虽然分析略嫌简单,但是其选题很有意义^[10]。

5 从社会行动视角看书院改制

刘少雪的研究是一项关于书院改制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以各省为单位进行书院改制研究也是比较宏大的研究,涉及的人物和历史事实较为复杂。事实上,也有一些对书院改制中单个人物的研究。从一些特殊的人物出发,观察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及他们在特殊时局下的应对、与外界的互动等,进而理解书院改制中不同人的境遇、主张、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博弈和命运,这也是理解书院改制的一种视角。

历史学者郭书愚近年来关于存古学堂和张之洞的系列研究,以扎实的史学功底、清晰的问题意识,以部分理解整体的研究思路,把书院改制的复杂性给呈现出来了。

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基于对书院改制后建设的学堂中存在的问题,力图以“存古学堂”保存国粹,遂在武昌创办存古学堂,后经学部的推动,存古学校被纳入各省的办学规划中。根据郭的研究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在湖北、安徽、江苏、山东、陕西、甘肃、广东、四川等地正式办有存

古学堂,在京师、浙江、湖南、广西、云南、直隶、黑龙江、江西等十几个省份也有建设存古学堂的提议或规划。而各地参与存古学堂的也多为地方饱学之士。存古学堂之规模与办学影响不容忽视。关于存古学堂的研究很少,存古学堂只是在其他研究中偶尔被提及,缺少专门的研究著作。作者认为,存古学堂是清季政府以学堂这一形式保存“国粹”的努力,是官方“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其对立面^[11]。

郭书愚关于存古学堂的系列研究,选取了长期被人忽视的存古学堂这一研究对象,对与之相关的人、事展开的研究,如其关于张之洞的研究论文《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新旧交映的激进时代——以张之洞的“守旧”形象为例》,荡除了人们关于张之洞的一些常见的错误认识,从书院改制之后存古学堂的兴办这一事实中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既求革新又要守住传统之根的复杂心态^[12-13]。郭的研究揭示了学界关于书院改制的一些先入为主、缺乏反思的前见,比如认为张之洞在新政后期创建存古学堂,是由先进转为保守的表现,这样一种认识很普遍;从而对书院改制研究中关于一些人与事的价值判断保持一种学术上的审慎。另外郭书愚在《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中,增进了对全国存古学堂以及整个清末“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从省一级的视角考察清末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为思考书院改制后新学中原有的传统如何保存、以什么形式保存等重要问题提供启示。

郭书愚的研究表明书院改制问题的复杂性是和当时时代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过于庞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可能因为学者的先在的价值判断以及史料的不足,导致研究大而无当。另外,郭书愚的研究从存古学堂这一点出发进行讨论也给人启发。书院改制的研究,除了直接的讨论之外,还可以从一个并非直接讨论书院改制的面向展开,如关于书院改制中学部的研究、书院改制中某个或某些重要人物的研究、或者某一种特别的教育组织的研究等等。

从书院改制中的重要人物入手,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相关主张、态度和实际行为的分析,来理解书院改制在不同人群的接受、认同程度和实际落实情况,进一步剖析书院改制中不同认知和应对背后的根本性分歧和涉及到的本质问题,是认识书院改制的又一重要途径。学者对于书院改制的重要参与者张之洞的研究较多,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地方官绅

和士人在书院改制中的作用。作为近代教育革新活动先行省份的湖南,其参与书院改制的一些官绅士人引人关注。刘平、章起辉对王闾运在船山书院的书院改制进行了探析,对湘省宿儒的王闾运在不同阶段对船山书院的改制态度三部曲“反对——应付——缓改”做了原因分析^[14]。李赫亚则对同时代执掌湖南著名书院的两位山长王闾运和王先谦各自的书院改制进行了对比研究,对传统知识分子在书院改制中的复杂心态做了一定程度的揭示。王闾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进行书院改革,而王先谦则接受西方学校体制,但其坚守学堂绝不能脱离中学之道,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15]。传统知识分子在书院改制问题上呈现出来的差异是很有意思的,可惜作者对其中差异缺少深入分析。另有学者谢丰以俞廉三、王先谦和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讨论了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16]。该研究和前面两篇论文一样,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但是因为史料不够充分,未能将书院改制中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物之处境更为全面的呈现,在人物差异的分析上也较薄弱。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理解书院改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宝贵的线索,但因为书院改制中的人物分析也牵涉很多方面,进一步的研究有待更充分的史料支撑。

6 书院改制的学术动因和社会结构的研究

前述研究基本上是和清末书院改制直接相关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主题虽不是直接研究书院改制,而是探讨了书院改制所处的思想文化氛围和社会结构,这些研究对理解书院改制也不可缺少。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桑兵、左玉河、艾尔曼、应星等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学术制度和思想文化转变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视野宏阔,理论深刻,为书院改制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坐标。

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思考晚清民国初年的教育变革的学者以桑兵为代表。桑兵在《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一文中讨论了书院改制问题,并且将书院改制作为近代教育从中学到西学的确立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加以分析,使人对书院改制背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学校体系在近代发生的彻底转变有一整全的认识。在这一整全的学校系统的变迁视野下,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之后新式学堂从最初的小规模到不断壮大,

直到清末新政中取代中国传统的书院成为主要的学校形式,包括紧随其后的新学制的颁布和废除科举,这一系列过程而建立起来的新学,作者认为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被外来文化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国被推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开始发生了文化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以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不是那么原汁原味,中国文明之于中国的意义渐渐晦暗不清^[17]。关于书院改制中争论的一大焦点就是由书院改成的学堂是否继承了中国教育传统的核心精神,作者的史料非常充分,论证扎实,论文中关于书院改制部分较短,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入。

左玉河关于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的研究中,考察中国近代以来逐渐成形的体制化学术的建构和演变过程,而中国传统的书院作为传统学术体制中重要的学术交流中心,其向新式大学等新式学术交流中心的演变过程是作者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关章节中,作者重点对书院改制中书院教学科目和课程的革新做了讨论。左玉河从学术体制的演变这一面向来看传统书院,虽然没有具体分析书院改制的过程,但是仍然有助于理解书院改制在时代文化大势中的位置。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清末科举与书院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随着科举制度的停废,各级官学随之瓦解,而书院制度也同时废弃,各种书院或消亡,或转变为近代新式学堂。作者认为书院之所以废除,因为它与科举制紧密联系:实乃受科举废除之累所致^[18-19]。

如果说思想史和学术史是书院改制的内在视角的话,思考书院改制的外部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则可以构成一个外部视角。在这方面,以美国学者艾尔曼和应星为代表。在《从理学到朴学》中,艾尔曼试图综合学术史、社会史和地方史、清代经济史等多种视角,来探讨清代江南地区的学术共同体如何走向兴盛,最后如何被太平天国毁灭。在第三章《江南学者的职业化》中,作者专门有一节讨论书院和江南学者的关系。作者认为书院的教学制度充分地满足科举的需求并与科举制进行结合,以及清代从皇帝到商人等各种对书院的赞助为清代中后期学者共同体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依托。在此基础上,江南地区的图书馆和商人办的出版社进一步联系这些书院的老师和学生,把他们紧密联系成一个经典学习—研

究的共同体。在艾尔曼的研究中,太平天国之前的江南地区通过在书院、科举制、藏书楼和出版社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已经构成了一个初级的学术共同体。作者不认为科举制以及书院体制完全是负面的。在艾尔曼的笔下,可以看到一个有活力的、丰富多彩的立足于书院的学人共同体社会,书院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20]。艾尔曼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书院改制,但是其对于书院改制之前书院如何嵌入社会结构中做了很好的研究。

艾尔曼关注的是清代成熟时期的科举场域和书院网络。应星关注的是科举改制之后,新教育场域如何一步一步兴起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的上篇是《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1895-1913年的湖南》。作者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场域”入手研究科举制场域的变化和变异,不过没有着力研究书院改制的产物学堂在后科举制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学堂成为了新的文化资本支配关系中的一部分,而之前,这一支配关系的核心是科举制^[21]。作者把学堂和科举制对应这一点很有启发,作者似乎认为古今支配结构的重心转变不是从书院到学堂,而是从科举制到学堂。这表明了将书院改制放在古今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7 结论和思考

以上关于书院改制的研究文献只是书院改制研究文献的一部分,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之后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来自教育学尤其是教育史学的学者和一部分专注于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者。教育史的研究学者主要在教育领域里理解书院改制,对书院改制中的教育变迁过程有比较全面的呈现,对书院改制中新学对传统的保存、一些重要人物在书院改制中的态度和参与、不同地区和省份的书院改制推进情况、书院改学堂的名实之争等问题都有探讨,这些研究利用书院改制中的教育史料、个人文集等历史材料展开分析,对相关书院改制的统计数据进行披露,为整体性地把握书院改制、认识书院改制的基本史实、把握书院改制中的一些重要线索,提供启示。而专注于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者往往从中西学的变迁、文化变迁和学术体制转变等更宏大的角度来理解书院改制,把书院改制放在一个变动和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来理解,将其视为近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呈现了书院改制背后社会变迁的脉络,其思想的深度和对

宏观图景的刻画为理解书院改制提供了独到的视角。这些研究的选题和研究方式不仅给人启发,研究者对一些不证自明的学术前见的反思也很有意义。

以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展开对书院改制的研究,在汲取以上研究群体对书院改制研究的成果基础上,重点需要考虑怎样把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和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社会学分析呈现出来,以推进对书院改制的认识。关于书院改制的已有研究为客观认识书院改制奠定了基础,教育社会学学者若能把书院改制放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来考察,充分发挥其学科想象力,同时保持学术思考的自主性,在书院改制这一本身就很有社会学特点的研究议题上,必能深化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进而推进对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研究:学科·学理·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0-55.
- [2] 熊江宁,李勇刚.北京“现代私塾”的现状与出路[J].北京社会科学,2011(05):57-61.
- [3]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449-497.
- [4] 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 [5] 邓洪波.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5-11.
- [6] 谢丰.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7] 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1.
- [8] 张传燧,李卯.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0(03):89-96.
- [9] 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 [10] 王星.论清末湘西书院改制[J].教育文化论坛,2012(1).
- [11] 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J],2008(2),83-102.
- [12] 郭书愚.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J].社会科学研究,2014(6):145-160.
- [13] 郭书愚.新旧交映的激进时代——以张之洞的“守旧”形象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4-54.
- [14] 章启辉,刘平.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127-132.

- [15] 李赫亚.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4):80-83.
- [16] 谢丰.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6):49-53.
- [17] 桑兵.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J]. 学术研究, 2012(03):81-96.
- [18] 左玉河.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 [19] 左玉河. 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 [20] [美] 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 [21] 应星.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年[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7.